

前言

虽然我以读者具备最起码的哲学知识为前提，但还是尽量用现代习语来阐述康德的思想。康德是近代最艰深的哲学家之一，因此，我并不奢望我已使他思想的每一方面都能为一般读者所理解。任何人，甚至康德本人，都很难说能理解他的思想的一切方面。康德思想是那样的深邃，那样的复杂，只有完全进入它的大厦之后，才能把握其问题的重要性和答案的想象力。康德想给人的认识划定界限；但又发现自己不得不超越这些界限。因此，如果为了弄懂康德的见解而不得不反复阅读这本入门书，那是毫不奇怪的。分享了这种见解就是看到了被改造了的世界；而获得这种见解则不可能是一日之功。

本书第一稿是在布拉格写成的。感谢拉迪斯拉夫·海达奈克博士，他不仅邀请我以绝对命令为题给他的研究班讲课，而且还为我树立了服从绝对命令的榜样。鲁比·米格、马克·普拉茨和多罗西·埃金顿对本书第二稿所提出的意见，使我颇受教益；最近十年来伦敦大学的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使康德哲学的教学成为一件有价值的工作，这给我以很大帮助；而我在诸多方面从伦卡·德沃夏科娃的友好情谊中受到的鼓励和鞭策，已非我所能表达——这本小书就是献给她的。

1981年5月于伦敦

第一章 生平、著作和性格

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除了义务(duty)外，不为任何东西所动。因此，他的生活平淡无奇。在他看来，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能控制自己而不受情感的驱使；应当对权力和名誉淡而处之，权力和名誉的意义，比起义务本身的意义来，应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能够轻松地按照这个道德理想而行动，康德约束自己，献身于学术事业，完全服从于一种毫无变化的机械程序。哥尼斯堡^①这位身材矮小的教授就这样成了典型的近代哲学家：蛰居于斗室之内，然而却视自己为无限空间的君主。

^①哥尼斯堡即现在苏联的加里宁格勒，当时是东普鲁士王国的首府。——译注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年出生于哥尼斯堡，父亲是一位贫苦的马具匠。在九个孩子中康德排行第四。康德的父母老实本分，是虔诚的虔信派教徒^①。在当时，虔信派这个路德教会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用劳动、义务和祈祷的神圣性观念慰藉困苦，在德国中、下层等级中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它对至高无上的良心(sovereignty of conscience)的幻想，对康德的道德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反理智的，但仍然是 17 世纪推动德国教育普及的一股主要力量。虔信派学校在哥尼斯堡创办起来了。由于一位聪敏慈善的牧师发现了康德的才智，康德在 8 岁那年被送进这所学校读书。这样一种教育竟然轮到出身低微的康德，这对于后世是幸运的，但对于年轻的康德本人也许就不尽如此了。他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同对老师们的难以忍受的热情的厌恶之心混杂在一起。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只字不提早年教育。关于他的早年教育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篇论教育的短文（根据康德晚年的讲课笔记编辑而成）中得到一些印象：

① 虔信派(Pietyism)是十七世纪德国路德教的一个教派
——译注

很多人想象他们的年轻岁月是其一生中最愉快、最美好的时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些岁月是最令人讨厌的；因为我们那时处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很少能够选择朋友，更很少能够有自由。

哲学家大卫·罗恩肯，康德以前的校友，在他们都成名之后给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三十年前，那些狂热的宗教徒们的迂腐而令人忧郁的（但不是毫无价值的）纪律压得我们俩透不过气来。”不可否认，康德从他的早期教育中既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忧郁感，也培养了非凡的自制力。成年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曾作过一番努力，用自制力去克服忧郁感，几乎获得完全成功。尽管环境窘迫，身材不端而瘦小；尽管失去了他所崇敬的父亲和深情热爱的母亲，康德还是很快成了哥尼斯堡最受爱戴的人之一，他的优雅、智慧和敏捷的谈吐，到处受到人们的欢迎。

康德 16 岁进入他的出生地的哥尼斯堡大学念书，六年之后毕业。因无法谋取大学教职，他在许多家庭当过私人教师，直到 31 岁才在大学获得编外讲师职位。这种讲师没有薪俸，但有资格公开讲课，通过私人学费而获得一点微

薄报酬。那时康德已出版了论动力学和数学的著作。他还通过私人教师身份带来的种种联系，获得了自如的社交机会，在这种交往中，他博得了—个“雅致的硕士”的美称。^①

哥尼斯堡那时是一个比较显要的城市，有五万居民并驻守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它作为一个为东普鲁士贸易利益服务的海港，人口稠密，其构成也形形色色，有荷兰人，英国人，波兰人和俄国人。那所 1544 年作为“阿尔伯尔金纳学院^②而创办的大学，是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意义的文化中心，但在 18 世纪中叶，这所大学充满了一种地方偏狭之气，默默无闻，以至于腓特烈大帝^③ 1739 年作为王储访问哥尼斯堡时，竟说这所大学“与其说适合成为科学的舞台，不如说更适合于训熊。”次年，腓特烈大帝登上王位，他竭力向他的王国的这一角落推行高度的文化和标志他的统治特点的思想宽容。这时

① 康德文雅的举止，入时的装束，掩盖了外表的欠缺。所以，在同时代人的印象中，康德不仅是一个“瘦小的硕士”，也是一个“雅致的硕士”。——译注

② 哥尼斯堡大学的别名。——译注

③ 腓特烈大帝(Frodevick the Great 1712 年—1786)，即腓特烈二世，普鲁士霍亨索伦朝第三代国王，1740—1786 在位。——译注

的康德已把真理和义务看得高于一切，他幸运地发现，这所大学对于他追求这两个目标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成为重大障碍。或许正是这一点（正如他对于他的裔胞之地的依恋感情一样），促使他留在这里长久地等待第一次委任，并在此后又继续等了 15 年，直到被授予他渴望已久的教授职位。这一时期，康德几次谢绝德国其它大学的聘请，继续在他的居室里诚心诚意地给学生们授课，正是这些讲授建立了他的声誉。他的智力劳动主要贡献给了数学和物理学，31 岁那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宇宙起源的论文^①包含了他对星云假说的第一次系统阐述。然而，他的任务要求他讲授范围广泛的学科，包括自然地理学。也许由于他不愿意旅行的缘故吧，他成了这门学科的公认权威和（根据极为赞赏这位哲学家的康特·普尔斯塔的意见）人们交谈的话题。^②

① 即《自然通史和天体论》。——译注

② 康德是第一个把自然地理学作为独立课程讲授的。有趣的是，他虽终身未离开过哥尼斯堡，但他凭借各种资料和生动的想象力，能对异邦情景、高山荒漠、地球的动植物分布等，作出引人入胜的描述。据说彼得堡科学院 1794 年选他为院士时首先考虑的是他的地理学著作。——译注

在某种程度上说，康德当上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教授而不是数学或自然科学教授，纯属偶然。然而，在康德的生涯中，从这时起，他就把全副精力都倾注于哲学，在课堂上详尽地讲述着十年后出版的、使他赢得德国最伟大的杰出人物的声誉的那些著作的思想。哲学家哈曼^①写道，听众必须在康德教授预定上课时间前一小时即早晨六点到达课堂，以便占上座位。康德的学生雅赫曼这样描述康德的讲演：

康德有一种独到的阐述和定义形而上学概念的巧妙方法，这种方法，就我所闻，就是在听众面前进行他的思想探索；仿佛他本人刚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然后，逐渐补充新鲜的决定性概念，一点一点地完善先前确立的解释，最后得出他对这个题目的研究的明确结论。对这个结论，他已经从各个角度作了全面考察，使聚精会神的听众不仅获得关于这个题目的知识，而且无意中受到思想方法上的教益……

^① 哈曼，（J. G. Hamann 1730-1788）德国作家、思想家
康德的友人其思想影响过赫尔德尔、歌德和雅可比。

— 译 注

在给朋友的信中。这同一位作者谈到了康德的伦理学讲座：

在这里，他不再只是一位思辨哲学家，而同时成了一位生气勃勃的演说家。他既满足了听众的智力要求，又完全抓住了听众的思想感情。确实，聆听它的创造者亲口以如此有力的哲学雄辩讲授卓越的纯伦理学说，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乐事。有多少次他曾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有多少次他曾激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波澜。有多少次他曾把我们的心灵和感情从自私的唯我主义的羁绊下解脱出来，升华为崇高的纯粹自由意志的自我意识，升华为对理性规律的绝对服从，升华为对他人的崇高责任感！

雅赫曼的话虽然有点恭维过分，但绝不虚假。无论是私下交谈还是公开讲演，康德的作为演说家的名望，远在他的那些最伟大的著作出版以前，就已得到人们的广泛承认。

康德的个人生活常常被喻为时钟一般机械和枯燥，并且是过分吹毛求疵、学究气十足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据说〔海涅就这么说〕哥尼

斯堡的家庭主妇们根据康德每天路过的时间校正钟表；据说（康德有一次就这么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的经常关注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自疑患症的表现；还据说他房间的陈设和家具的简陋显示了他对美的冷漠，而他恪守时间的刻板生活则掩饰着一颗冰冷甚而是冻僵的心。

的确，康德的生活即使不是机械的，至少也是有严格戒律的。他的男仆每天遵命在清晨五点唤醒他，并且不容有任何例外。他总是头戴睡帽、身穿长袍在书桌前一直工作到七点，而每当上午讲课回来后又立刻恢复这套装束。此后他继续工作到下午一点，才开始进他那每天仅有的一餐。饭后不管天气如何总是散步。不过这项活动他是独自进行的，因为他有一种古怪的看法，由于谈话使人用口呼吸，因此不应当在露天进行。他讨厌喧闹，曾两次更换住处以避他人吵嚷，曾一次愤慨地写信给警察总监，要求阻止附近监狱的犯人唱圣歌以自慰。众所周知，除进行曲外，康德不喜欢音乐，对视觉艺术亦毫无兴趣——他仅有一幅版画，一张朋友赠给他的卢梭肖像。

康德深知当时知识界所招受的责难。他通过这幅版画的主人来作自我辩解，说要不是卢

梭使他确信，知识界可以在恢复人权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会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无价值。象所有献身于精神生活的人一样，康德需要强迫自己服从那种生活戒律，这不仅没有使他丧失精神创造力，反而使他的天才能够得到最充分的发挥。他爱寂寞，同样也爱交往。他总是毫无例外地有几个客人同他共进午餐，并且总是在当天上午去约请他们，免得他们需要谢绝其他邀请而感到为难。他供给每人一品脱^①红葡萄酒、结果可能的话，再加几道最爱吃的菜。他和各人们一直谈到三点，使他们既感到快乐，又得到教益。他努力让午餐在欢笑声中结束（当然，这既是康德认为欢笑有助于消化而努力做到这一点的结果，也是谈话本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康德在席间现着许多讽刺的笔调，实际上，他最喜爱读讽刺作品。他对于诗歌的热爱同对于音乐绘画的冷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他对健康的关注，也不过是一种康德式的对义务的哲学沉思的结果。他既不赞美也不欣赏定居生活，而是把它看作不过是训练自己的智力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浪漫主

①品脱，容量单位。1品脱，英=0.568升，美=0.473升。——译注

义运动的最伟大和最富于激情的著作家之一赫尔德^①听过康德的讲座，以后又强烈地抵制这些讲座的影响。然而，他高度评价康德本人，并这样概括康德的特征：

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位哲学家，他就是我的老师。虽年已入壮年，但他仍有着青年人的那种充满快乐的饱满情绪，我相信，这种情绪他一直保持到垂暮之年。他那为思想而生就的宽阔前额显露出从不消逝的开朗与欢快的神情。丰富的思想从他的唇际轻吐而出，诙谐、警句和感人的幽默他运用得得心应手，他的富于启发性的讲课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消遣。

他考察过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加通、克卢秀斯(Crusiss)^②和休谟，分析过物理学家开普勒和牛顿所阐述的自然规律。他以同样的精神——正象他在自然科学中注目于每一个进入他视野的新发现一样——高度赞赏当时问世的卢梭的著作

① 赫尔德，(Herder 1744—1803)，德国思想家、历史学家。康德的学生和友人。——译注

② 克卢秀斯，(1715—1775)，德国神学家，反对沃尔夫哲学。——译注

《爱弥尔》和《爱洛伊丝》,评价了它们的意义,并且总是又回到关于自然和人的道德价值的毫无偏见的知识上来。

人类史、民族史、自然史、自然科学、数学及他自己的经历,是使他的讲课和日常生活生气勃勃的泉源。他从来不对那些他认为值得了解的东西漠不关心。任何阴谋诡计、任何局部利益和好处、任何对名望的欲望,都毫无力量妨碍他去发展和阐释真理。他鼓励并耐心地说服人们独立思考,专横与他的本性格格不入。这个人——我怀着最深切的感激和崇敬之情直呼其名——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我回想起他的形象就感到愉快。

作为大学教师,康德的责任是讲授哲学方面的全部课程。由于他长年把大部分精力投到了教学上,因而只发表了一些简短而不成熟的著作和论文。1781年,当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也是他一生中的最伟大的成就)《纯粹理性批判》发表时,已年届 57 岁。在给摩西·孟德尔松的信中,康德就这本书写道:“虽然这本书是我十二年的沉思的产物,但却是我在大概四个或五个月的时间内仓促写成的。我极为注意

其内容而较少考虑其文体和通俗性。’^① 为了减少《纯粹理性批判》中出现的阅读困难，他出版了简短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一书，在这本书中，旗帜鲜明的论战同《纯粹理性批判》中那些最有攻击性的段落的浓缩结合在一起，但这些浓缩仍然模糊难懂。1787年《纯粹理性批判》印行第二版时，康德重写了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章节；结果是照样艰深。于是评论家们终于一致认为，康德这本著作的晦涩难懂与其说是源于文体，不如说是由于思想本身。然而，尽管有这种困难，这本书还是很快一举成名，以致整个德语世界都在提倡、教授、反对有时甚至是审查的刁难‘批判哲学’。康德增强了自信心，1787年对赖因霍尔德^②（他为使康德思想通俗化作了大量工作）这样写道：“我能向你保证，我越是长久地继续走我的路，我就越不担心会有任何反驳……能严重摧毁我的体

① A·兹韦格（Arnulf Zweig）编辑并翻译：《康德哲学通信 1759—1799》，芝加哥，1967年版，第105—106页。

② 赖因霍尔德，（K. L. Reinhold 1758—1823），德国哲学家，曾大力宣传康德哲学，后支持费希特，继而又调和费希特和雅可比。——译注

系。’^①《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问世三十年后，斯塔尔夫夫人^②公正地概述了康德的这第一部《批判》的影响，她写道：“当它所包含的思想财富被充分发现时，它在德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轰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自那时以来，文学和哲学中所完成的一切，都是这部作品所推动的结果。”

在给孟德尔松的信中所提到的那十二年沉思期间，康德几乎未出版任何著作，他的早期（‘前批判’时期）著述对于研究其成熟哲学的人只具有外围的意义。然而，一旦批判哲学被表达出来，康德就越来越充满信心地继续探究其细节。《纯粹理性批判》系统探讨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接着，《实践理性批判》（1788）涉猎了伦理学，《判断力批判》（1790）则主要论述了美学。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它著作，所谓“柏林版”康德著作集现在已出版了整整 27

① A. 兹韦格：《康德哲学通信》（1759—1799），第 127 页。

② 斯塔尔夫夫人，（Mme de Staël 1766—1817），法国女作家、文艺理论家。她的《论激情对个人与民族幸福的影响》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她 1801 年出版的《论德国》一书，论述了德国的风俗、文学与艺术、哲学、伦理与宗教。——译注

卷。在这些其他著作中，这样两本特别与我们有关：一是前面已提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是 1785 年在第二部《批判》以前问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这本书包含着康德道德理论的激动人心的表述。

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哥尼斯堡呼吸到了启蒙的空气，康德赢得了腓特烈的大臣们，尤其是教育大臣冯·策德利茨的尊重（《纯粹理性批判》就是题献给他的）。腓特烈·威廉二世^①继位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当中，他的大臣魏乌纳起了很大的影响，1788 年他负责宗教问题，企图结束对宗教的宽容。康德的《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经过哥尼斯堡学院的批准，逃避了依法进行的书报检查，于 1793 年出版。魏乌纳对此极不高兴。他以国王的名义给康德写信，责成他就此事作出说明。康德在回信中向他的国王严肃地保证，今后无论在课堂上还是在著作中都不再公开讨论宗教问题。国王一死，康德就认为自己解除了这一保证。然而，同当局的这一次冲突使他十分痛苦和辛酸。康德曾为自己是一个忠顺的臣民而感到自豪，虽

① 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rick William II 1744—1797），腓特烈大帝之侄，1786 年继腓特烈大帝之位任普鲁士国王。——译注

然他曾在一位英国人面前表示过对共和国的同情。当时他说得那么轻松愉快，结果挑起了一场争论，最后他以雄辩的言辞赢了这场争论，驳倒了那位英国人的观点。这个人叫约瑟夫·格林，是哥尼斯堡的一位商人，从那以后，他成了康德最亲密的朋友。

康德喜欢同妇女交际（只要她们不妄称理解《纯粹理性批判》），他也曾两次打算结婚，然而，每次他都犹豫很久，直到最后决意不婚。一天，他的那位不修边幅的男仆身着黄色外衣，醉熏熏地来到桌旁，康德怒不可遏，命令他脱掉卖了，并答应补偿他的经济损失。当时康德非常吃惊地了解到这位仆人曾结过婚，现在是个鳏夫，正准备再婚，那件黄外衣就是为婚礼买的。康德对这些意想不到的事大为震惊，此后再也没有满意地看过他一眼。看来康德无法使自己相信婚姻——他曾把婚姻说成是两个人的“各自性器官的相互利用”的协议^①——是人之常情。然而，在他的早期著作《对于美和崇高的感情的观察》（1764）中，康德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两性之间的区别。他激烈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分有一种共

① A. 兹韦格：《康德哲学通信》（1759—1799），第 235 页